

第十七期要目 (五月七日出版)

蔣總裁怎樣在期望我們…… 吳開先  
 政黨論ABC…… 陶百川  
 黨派關係的一個新階段…… 黃旭初  
 孫中山先生的「新治派」…… 曹欽仁  
 中共要人張國燾案的面面觀…… 記者  
 談什麼黨派問題…… 胡秋原  
 蔣史方面說明中日的前途…… 葉青  
 蔣委員長與陳英士先生…… 魏雲輝  
 潘行雜憶…… 陳之通  
 夜泊忠州四首…… 潘公展  
 蔣馬關係和國際局勢…… 楊東明  
 王震章

# 血路

每星期六出

本特輯

政黨論及黨派關係的



## 蔣總裁怎樣在期望我們

吳開先

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我們的領袖蔣總裁，怎樣在期望我們呢？記得有一次，總裁提出黨歌來解釋；他說：我們是革命的前衛，民衆的先鋒；我們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要我們照着「總理的話去做，就是要『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第一兩句，是要我們堅定三民主義的信仰，並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第二兩句，是揭示奮鬥的精神，——必須要勤，勇，信，忠；最後兩句，是要我們一心一德，不屈不撓，奮鬥到底，抗戰到底，以求最後的勝利。凡此，多是寶貴的教訓，我們自當服膺，力行。

最近，總裁給各省黨部一封信，對於我們同志的期望，更具體的指示出來：

第一，總裁訓勉我們要振奮「犧牲奮鬥」的精神，以犧牲爲天下倡。原來這次抗戰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事。敵軍的目的，在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所以每到一處，屠戮焚掠，迫辱奸淫，連順民也做不成。除了全國人民一致起來與敵人拚命外，再沒有自全的方法。而我們同志更當冒險犯難，以犧牲爲天下倡。試看總裁說：「本黨各縣地方之黨委黨員，奉行主義，許身黨國，處此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冒險犯難，應以犧牲爲天下倡。務當格外奮發，勇往直前。……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第二，總裁訓勉我們要動員紳士民衆，共同奮鬥，而我們自己則要盡力工作，不計名位。原來這次空前的抗戰，一定要全國總動員，方能克敵致勝。「吾國有史以來，每當異族侵凌之會，特多慷慨忠義之賢。有明一代，倭寇披猖，不滅今日，其時我魯蘇浙閩各地豪傑，糾集民力，自動殺敵，保鄉著績者，不可勝數。編復當前之危難，尙想前賢之節概。我各地之父老士紳，救國自救，雪恥復仇，當必有投袂而起，赴義爭先者矣！」所以總裁指示我們：「一切動員抗敵事宜，必須與當地官民通力合作。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名位得失，絕非所計。對於地方公正賢明負有聲望之紳耆，尤應傾誠推重，敦請主持，號召民衆，共同抗戰。而我黨部同志，則多方協力，矢志補助；但求有裨於殺敵，無惜執鞭以相從」。這兩句金玉良言——「但求有裨於殺敵，無惜執鞭以相從」——請同志們牢牢记着！

最後，總裁更指示我們工作的路線和方法。他說：「我各地父老士紳，或爲鄉邦與望所歸，或爲才智優長之傑，務各乘時崛起，當仁不讓，號召鄉里子弟，嚴密組織。本軍法之勤，爲抗戰之協助。或爲前線部隊盡工事輸送之勞，或與游擊部隊通呼吸夾擊之力。即在淪陷區域之內，遊軍結集，多在交通便利之城市，其他村落或偏僻縣屬，所有民衆依舊可以自由活動，提擊運用，儘多機會。其有避難他鄉者，尤盼速歸桑梓，援西夫有責之義，奮死中求生之圖。洋勳民衆，躬爲領導，乘機抵瑕，伺機擊敵。」

此外，總裁更以赤誠，鼓勵我們去奮鬥。他說：「本委員長總領師干，統籌戰局。凡屬披髮纓冠獸身報國之賢豪，皆當視同致命疆場股肱心膂之袍澤。憂患相同，生死與共。困難必予解除，行動必使便利。其有特殊建樹，協應機宜，懇著勳績者，必予愈格之酬庸。其有不避艱險，取義成仁，因而犧牲者，必予特殊之褒卹。」

我們同志早在入黨的時候，立下獻身黨國爲民前鋒的宏願，現在黨國重危，正是我們求仁得仁的時候。「時乎不再，願共圖之！」

社 長  
 總 人  
 通訊處：漢口  
 總經售：漢口  
 地址：湖北  
 價 目  
 本報已呈請政府備案



迷信政黨的政見。我們估計一個政黨的價值，一方面要看牠的主義和政綱，一方面也要看看牠的領袖和幹部。美國有一位政治學者，說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好比兩個「空酒瓶」(Empty Bottles)；外面雖然貼着不同的牌號和名稱，但實際上是一樣的空洞無物，因而兩個瓶裏都可裝入任何的酒，甚至相同的酒。原來政黨的獲取選民的票子，一定要面面俱到，代表各方面的利益，不肯輕易見棄於某一部份選民。這樣的結果，政綱的範圍不能不求其廣泛，辭句不能不求籠統，(甚至含混)，這已是有些「言之無物」；而且爲與他黨比較和競爭起見，他黨政綱方面所有的優點，也須儘量吸收；這樣，兩個政綱幾乎變成一個政綱了。

這樣的結果，政黨在政綱所規定的，難免有些「違心之論」。因爲自始就無實行的誠意，所以登台以後自然不會照着政綱去切實執行。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羅爾爾曾經說過一個諷刺的笑話。他說：有一乘客某次站在車站月台上，一個車站職員干涉他。那位乘客憤然說：「月台(Matform)不是預備給人站的麼？」職員回答說：「月台不是給人站的，乃是給人走到車廂去的。你怎麼可以站在月台上呢？」羅爾爾慨然說：月台是給人走到車廂去的，政綱(Matform)是給人走到政治舞台去的。(注意月臺和政綱兩個名詞，英文都是 Matform)哈哈！政綱的作用，原來如此而已！

人民雖然不可過分迷信政綱，但是政黨却不可不努力去實行政綱；而在事實上，政黨爲求下屆選舉的勝利，一定也儘可能的求其支票之兌現。因此，人民對於政綱，在原則上還有相當的信仰，而政綱至今仍爲政黨必備的法寶。

政黨誠有若干流弊，但對國家究竟也有許多貢獻。第一，號召民衆的結果，牠(指政黨及政黨制度)可以鼓舞民氣，發揚民意；第二，因爲集結政見相同的人的結果，牠可以組織民衆；第三，因爲

宣傳與理論鬥爭的結果，牠可以教育民衆；第四，因爲根據民意制定政綱的結果，牠可以造成比較具體堅強和普遍的輿論；第五，因爲政黨提出候選人的結果，牠可以幫助選民物色較好的代表；第六，因爲政黨組織黨團指導黨員的結果，牠可以幫助議會成立多數公決的議案，(否則議論百出，多數公決的政治則難實現)；第七，因爲在朝黨一黨組織政府的結果，牠可使政府實施一貫的政策，(就是牠的政綱)，而且有其實施的可能，(因爲政府是一黨的清一色)；第八，因爲在野黨監督政府的結果，牠可以促成政治的清明和政府的負責任，並可保證政府的重視輿論；第九，就革命黨方面說，牠可使革命容易成功。

但是，我得很坦白的承認：政黨誠有許多好處，然而伴着好處來的，就有許多壞處。可是，終因政黨有許多好處，所以各國都有政黨的組織。羅爾爾說得好：政黨好像波浪，小河裏可以沒有波浪，大海中是不會沒有波浪的。

自從國社黨和青年黨公開以後，中國的黨派關係，已經踏入一個新階段。政黨的存在，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預料今後將會發生更多的政黨，自然難免有若干流弊。我們唯有希望：

第一，政黨之間要竭力避免磨擦，最好大家要有 Sportsmanship，(陳立夫先生譯爲「禮義」)；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第二，民衆要用是非非的精神，判斷和監督政黨的言行，使政黨能尊重民意，效忠國家。

第三，在抗戰中，除中央設立參政會外，在各省縣也設立地方參政機關，在抗戰勝利之後，並即設法召集國民大會，使政黨活動格外容易走上正常的軌道。這叫做 Ballot for Ballot (可譯爲「以選舉票代替槍彈」)。(本章完，全文擬俟參考書到後再寫)。

### 夜泊忠州四首

潘公展

羣山急水送輕舟，一日光陰半臥遊，枯水灘頭貧戶窟，兩三燈火是忠州。

半山電放太平燈，(註一)小市危樓不敢登，今亦兩京胡騎到，客過無淚弔龍興。(註二)

高腔鄰室唱巴人，(註三)故事推崇漢老臣，瘦斂益州今更甚，蒼生何處覓輪巾！

扣舷歌詠有諸生，(註四)江自東流舟自橫，聽到口琴悽楚處，孤城擊柝已三更。

註一：半山有電炬或塔，舟人謂沿江各邑俗，放上元燈可保船家平安。

註二：工部題忠州龍興寺院壁有句云「空看過客淚」放翁龍興寺弔少陵寓居有「戍火胡塵獨兩京」句故云。

註三：川戲多高腔，相傳下里巴人即川戲。

註四：時另有若干少年唱救亡歌曲。



# 黨派關係的一個新階段

黃旭初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國內的黨派關係開了一個新局面。首先，張君勳先生代表國家社會黨上書蔣汪正副總裁，說：「方今民族存亡，國不容雙，……尤當追隨公等之後，鞏固主權，保全國土」。張先生因「政治不獨限於若干項之大綱，尙有因時因地因事而生之問題，非今日所能預測」，爲求與國民黨政見之始終一致，並代表黨社黨切實聲明：「同人等更願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宗旨，與國民黨領導政局之事實，遇事商承，以期抗戰中言行之一致」。

接着，左舜生先生代表中國青年黨，也上書蔣汪兩先生，對國民黨有所表白。其最後一段說：「同人等觀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備有與國民黨共艱難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計及」。

對於以上兩黨代表的信，蔣汪兩先生覆函表示欣慰。

中國共產黨呢？他是否也擁護國民黨？何以他沒有正式表示？一部份人似乎這樣懷疑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三先生，因於二十九日以答覆一位同志的方式，在一封公開信中，解答一般人的懷疑，並對國民黨再度表示了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段這樣說：「去年重慶橋事變及「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後，國共兩黨關係迅速穩定和增進，因而有去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宣言的發表及蔣先生在九月二十四日談話的發表。在去年九月二十三日宣言中，中共中央不僅又一次坦白說明自己抗日救國政策的內容，而且又一次懇切說明中共對國民黨及中山先生手訂的三民主義基本方針

的贊助和擁護的立場；同時，在蔣先生的九月二十四日談話中，正式代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自此以後，在抗戰以來的整個時期中，國共兩黨關係日益增進，已爲舉世公認的事實。因此，確如來信所說，共產黨沒有再重複一次類似去年九月已經發表的說明國共關係一類的文件的必要。」至於對於國民黨代表大會以後的輿度，蔣中日報爲代表中共主張之報紙，爲中外共知之事實；故新報日報幾篇社論之主張，即爲中共對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的響應，這是明白無比的事實。」

經過這樣一來一去的聲明以後，黨派關係的爭論，似乎可告一了。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欽佩蔣汪兩先生以及國民黨幹部處理這個問題的賢明。而各黨各派雖然不能如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希望那樣「有志之士，一致加入（國民黨），共同奮鬥」，但能這樣被肝膽相照，表示擁護國民黨的熱忱，我們也應當表示欽佩和欣慰。

不過對於這個問題，我個人還有一些感想：第一、中國現時黨派之多，是經過了各階級和各類主義；除了國民黨和上文所述的三黨外，尙有不少無黨派等小集團。這些黨派，大家表示擁護政府，可是有的難免把政府看成一塊「陸稿薦」的招牌；大家表示服從蔣總統，然而大家視領袖爲一個大家庭的家長；大家看到了民族的危機，可是有的仍在趁這個危機，拚命地爲各自的「私房」

發展。這種現象，是使中國無法形成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心力量。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看到這個弱點，雖沒有明白要求合併各黨各派，但爲了挽救民族的危機，不得不大聲疾呼，在其宣言中熱烈的希望「有志之士，一致加入，共同奮鬥」。蔣汪兩先生覆張君勳先生的函中，也念念不忘的提及：「更望全國賢哲之士，或加入本黨，共同負荷，……」然而可惜張先生都沒有這樣的做；這實在有些美中不足。

第二、任何民族，不能也不應拋棄他的歷史。一個民族任何時代的中心思想和文化，都是由其自己的歷史演變而來。祇有帶着民族的移殖而帶去了這個民族的文化，或輸送一些外國文化以充實固有的文化，決不應，也不能，將另一文化一式一樣地移殖到有文化的民族裏來，而把固有的思想和文化完全抹殺，一脚踢翻。例如馬克思主義到了俄國，不復是馬克思主義，而成爲列寧主義，並把世界革命一變而爲「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又如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想拋棄中國民族的歷史，移殖馬克思或列寧主義作爲我國民族的中心思想，並想另外建立一種外國的文化。可是這十年來的教訓，使他不能不回頭過來說：「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所必需」。但是我真不懂：一切黨派既皆以三民主義爲其中心信仰，爲什麼還要抱殘守缺，放不下自己那一套！更爲什麼有的還要用「舶來品」，而不用道地的國貨！

由於這兩點缺憾，——一是中心力量的問題，一是中心思想的問題，我們對於黨派關係恐怕不能像表面那樣的樂觀。我們既沒有方法使各黨各派與國民黨合併成一個中心力量，也沒有方法使其以三民主義作爲他們唯一的中心思想，我們爲民族國家的前途，祇有希望大家信守諾言，切實團結，「遇事商承，以期抗戰中言行之一致」！



# 梁漱溟先生的「村治派」

曹啟仁

隨着時勢的需要，所謂「各黨各派」都先後公開出來，我們以為對於梁漱溟先生的「村治派」，也與他黨他派同樣的有加以認識和介紹的必要。

梁先生是實際從事於鄉村工作的。最近十年來，他率領着四千多同事和學生，在山東省鄒平荷澤濟寧等縣，埋頭幹「鄉村運動」。「村治派」這個名詞，大約就是這樣來的。

但對於這個名詞，梁先生似乎一向否認着：「吾儕被人目為國內政治運動之一派，加以黨派名號，如「村治派」「農民社會黨」之類，即日本報紙雜誌書籍亦數數稱引，而有「農村社會主義」等名詞。其實吾儕固始終未曾建立一團體組織。」（見梁先生的告「山東鄉村工作同人同學書」——下同）。但在同書內，又有這樣的一段：「余自視不足為團體行動之領導者，嘗仔細同人同學分析之；而仲華先生（按即梁仲華先生）同亦缺乏自信。彼此均非為謀推讓，而平落於無人敢當。二十五年下半年余及同人合力推戴仲華先生，然費力氣，結果仍不敢遂，竟以模糊敷衍終此局。」既以推戴了梁仲華先生為領袖，似乎已有一個「團體組織」。

這至抗戰事起，尤其是在復復築天敗以後，他痛感多年工作之敗於一旦，乃思團體組織更有必要建立的必要。他說：「今吾儕向前只有幹與不幹兩途。不幹，即從此不必見人；幹，則必自建立團體組織。前此難於決定之三問題：第一問題今上所有團體全不存在，同人同學多已星散，決定從少數人之組織組織作起。第二問題亦以山東政局改換，吾儕均得繼續局外，無所顧慮。第三問題余恐再貽誤組織進行，決心擔任領袖。滿懷慷慨之餘，除自

力自勉外，更無他話所說。」照此看來，梁先生自己以後是更組織團體，更奮肯地幹了。

「村治派」究竟是怎樣一個組織呢？梁先生說：「吾儕團體組織，非普及之學術團體，如「科學社」「平教會」之類；亦非通常之政黨，如「共產黨」「國家主義青年黨」之比。但吾儕實為包涵政治運動之一種社會運動。」他又說：「同於中國古人講學之義，但非止於知識思想之間。——是為從中國特有之學術團體。吾儕既從事政治活動，何以又非政黨？政黨必爭政權，吾儕不爭政權，便非通常之政黨。——是為今後中國所特有之政治團體。」由此可知梁先生所倡導的組織，是一種有政治活動的學術團體，也可以說是富有研究性的政治團體。但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政治集團，在性質上與從前梁啟超先生的「研究系」是否一樣？

「村治派」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具體的政治綱領和團體組織的章程，但她的主要精神，據梁先生自己分析，約有下列六點：

一、建立團體之根本動機，為實現人生向上。將借助於此團體組織以實現個人向上；更從個人的向上完成人類社會的向上，（或云文化的向上）。本乎此義，凡參加組織者，第一當於此立志，以親師取友為心。古人貴乎朋友責善，貴乎互相夾持，今人在團體內動於檢討批評，皆所當則效而力行之。

二、在人生向上之意義內，則學術研究在所必需。又在社會運動立場，為理論，為技術，均非作學術研究不可。團體當以此要求於分子，分子當以此要求於團體。

三、在師友情誼上，在團體關係上，宜求生濟互助，於朋友通財之外，更進而建立共財。

四、建立團體之眼前最親切的動機，為解決中國問題，一面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完成社會改造。如吾儕所信，其道在鄉村建設；而其事則必須聯合國人協力以圖之。今將借團體力量發揮吾儕之所信，更從團體以立聯合協力之端。本乎此義，凡參加組織者必於鄉村建設理論有認識有信仰，更且直接或間接服務於鄉村，即每一分子必有其職業或工作，其職業或工作必直接或間接為服務於鄉村的。蓋吾儕團體為從事於鄉村工作者的團體，與一般政黨多聚無業遊民，專以奔走活動為事者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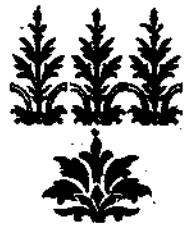
五、中國以其散漫的社會形勢，在國圖問題下，其唯一應有者，乃為二重組織的政黨：各別團體為第一重，團體與團體之聯合為第二重。吾儕之建立團體，乃為參加此聯合，而非建立團體以事競爭角逐。

六、此聯合體為代表全民族社會，（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階層各職業），時常保有一致的立場，必不能直操政權。蓋此與其他國家之有聯立內閣混合內閣或舉國一致內閣等全非一事，不可相比。此時之政府機關，應不着某黨派顏色，亦非混合色，而應為一「無色透明體」。吾儕誓自誓永遠守定在野營壘，其義在此。

我以為這樣一個組織，誠如梁先生自己所說，不是什麼政黨，因為牠還沒有具備政黨的必要條件。

但是梁先生對抗戰期間的政治問題，也曾詳加研究。據梁先生自己說：「我們的要求可分三點言之：（一）我們要求抗戰的政府，應在廣大社會裏有其根基，上下氣脈貫通，政府與社會打成一片。（二）我們要求消除各方面（黨派階層以至種種）以及各個人間的隔閡、猜忌、抵牾、磨擦，而合全體為一個力量以抗敵。（三）我們要求充分利用知識頭腦，將一切事情為有統制有計劃有條理的秩序的進行；不要敵人未來破壞擾亂，而我們先自亂自毀如今日者。總括言之，我們要求民族社會力量的與





# 中共要人張國燾案的面面觀

記者

據說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中共從前有兩大要人，就是所謂「南陳（獨秀）北李（大鈞）」，張國燾在北方坐著第二把交椅，李大鈞死後，並代之領導北方黨務，卓著聲譽。一九三〇年前後，在俄國參加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工作，回國後與徐向前關係頗密。此次被共產黨開除黨籍，我們認為那是中共的內部問題，無足重輕，但為保存這一段名貴的史料，並使讀者得一整個的觀念起見，故特搜輯有關係的材料，編輯這篇「面面觀」。

## 一、一個驚人的公告

在本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上，登載有如下一段「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的啓事：

「張國燾已於四月十七日在武漢自行脫離中國共產黨。查張國燾歷年來在黨內曾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其最著者為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的及中央鬥爭，並自成立偽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在中央發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後，他始終表示不滿與懷疑。西安事變時，他主張採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的和平方針。此次不經中央許可，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的各種活動。雖經中央採取各種方法，促其覺悟，回黨工作，但他仍然毫無改悔，最後竟以書面申明自行脫離黨。張國燾這種行動，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張國燾歷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後發展必然結果。中共中央為鞏固黨內鐵的紀律起見，特決定開除其黨籍，並予以公佈。」

## 二、張國燾的聲辯

隔了兩日，武漢報紙上登出張國燾的聲明文：

「閱讀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之決定一節，本人特為如下簡單之聲明：（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為國家民族效力。（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三）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為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為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感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為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之力量。（四）本人曾本以上主張，用至誠態度，與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三同志初步商討，不料此項商討僅在開始進行，中共中央突有關除本人黨籍之決定，公佈報端。本人與中共關係極深，該決定內所說各點，均不必急於答辯，其望中共中央和中共諸同志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並與本人誠懇商討，不使稍有遺憾；俾吾人與全國人士，均得共本抗戰救國抗戰建國之主旨向前邁進，則幸甚矣！」

## 三、偵探案一樣的故事

「我們要求全國更進一步的團結，以加強抗戰政府的力量。」

至於如何達到此要求？如何可以實現更進一步的團結？梁先生以為須實行下列兩層：

「（一）確定國策，或曰：「共同綱領」；（二）於此共同綱領中，應將下列兩大問題及其細目均有確切之決定：（甲）如何抗敵，完成民族解放？軍事、外交、內政、經濟、一切為其內涵之問題均各有所決定。（乙）如何建設，完成社會改造？決定理想目標，並切就事實決定其達於實現之路線步驟。」

梁先生又一再申說：「吾人當知團結，非高調而結，乃因行動而團結；故團結必於行動求之；行動如何，又必於方向目標求之。」足見梁先生很注重共同的方向和目標。

梁先生為了商討政見，曾經不辭勞苦，跑到延安，親自訪問過共產黨毛澤東先生。他曾提出「如何求得民族解放」及「如何完成社會改造」兩大問題，與毛氏連談數夜。照梁先生的結論，以為：單在眼前抗日問題上講團結，似乎不夠。因吾人實有此兩大問題，而且完成社會改造係吾民族自身長久之事，更為基本，與抗日為一時問題者不同。苟於此基本問題隱略不談，則縱然團結，殊不徹底。

因此，梁先生對於國策合作的前途，有這樣的憂慮：「共產黨朋友，於中國社會散漫，中國問題從外引發之兩點，以事實昭然，亦無法全不承認；但總認中國亦為階級社會，中國革命亦有階級鬥爭在內；中國眼前僅為階級合作，是半殖民地社會所不得不然。吾試問眼前團結禦侮，是否不禦侮即不團結？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之對內鬥爭，為一時放棄？為長久放棄？中國共產黨不須要奪取政權，完成其革命建設乎？所得回答，皆曰今日團結禦侮，他日團結建國，中共不一定要自操政權，社會主義可由和平轉變得之。吾信其言，但吾不能不疑其出於一種願望，非出於一種見地。」

綜上所言，我們深深感覺到梁先生的見解確有少獨到之處。但是他的組織，能否像他個人那樣的健全，這是一個問題。讓我們拭目以觀其將來！

大約是中共中央覺得對於張國燾的聲明有答辯的必要，所以中共負責人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等三人，在其答覆「子健」的信中，公布了開除張國燾的經過。茲將其最重要的一段，全部轉載於下：

「此次張國燾從延安到武漢，以至被開除出黨的事實簡單經過如下：

四月四日，因為張國燾在邊區政府工作，他要求去中部參加祭黃帝陵。可是祭陵完畢後，張國燾不通知我黨中央即自行到西安。到西安後，住西京招待所兩天，沒有與駐陝辦事處發生關係，只在火車快要開動前，用電話約林祖涵同志在車上略談幾句，即自動來武漢。到武漢後又不肯來駐漢辦事處，經我們三人增加責勸，才勉強搬往辦事處。當時他曾電告黨中央謂：「不辭而別，歉甚，願在武漢做些工作。」我們看到他這種態度，表示還有回黨工作可能。既來武漢，他是邊區政府負責人之一，當然應當晉謁中央政府領袖，報告邊區工作狀況。於是恩來同志陪他晉謁蔣先生。不意在見蔣先生後，渡江至江漢碼頭時，乘恩來同志與另一同行朋友談話之際，抽身疾馳而逃。始在漢口，繼在武昌各大街小巷，亂跑亂撞數小時，然後始在武昌寓住一個事先與別人約好旅館中。我們見國燾深夜未歸，派人四出尋找，比得知他所住旅館後，即又於深夜渡江勸其返漢。當他不得已而返漢時，堅不願再回辦事處住，於是遂轉寓於一個朋友家中。在我們與他幾次談話中，他在政治上再三表示說：「國民黨沒有辦法，共產黨也沒有辦法，中國很少辦法的。」因此，他再三提出意見說：「我感覺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家去作老百姓，我家裏飯還有得吃的，我此後再不問政治了。」同時，他又私自去找看陳獨秀等人。由此可見，張國燾在聲明中說什麼他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並未絕望等，完全係一種欺人自欺的昧心之談。

當時他的回答，認為第一條不可能，可以在第二條三條中考慮，並允兩日內閉門考慮後答覆。不料談話後不及一小時，即十七日晚，張國燾竟跑到太平洋飯店，乘一有三人保護的汽車而去。臨行時，用書面寫交我們三人的信說：「弟已決定採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寓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從此後，張國燾便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因此，黨中央於十八日正式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於二十二日才將開除他的決議公佈，因為中央還希望他在脫離黨後或尚有所考慮。

只在開除黨籍的決定公佈後，張國燾才又派人將他寫明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兩信同時送到，在二十二日的信上說：「連日因寓所未就緒，故不曾致函諸兄，昨晚即寫好一信，擬今晨派人送來，突閱報載有開除弟黨籍的決定之公佈，深使我痛心。：：：千祈我們間應維持冷靜而光明之政治討論，萬一決定不能改變時，亦希彼此維持最好友誼。」由此可見此次中央開除張國燾的黨籍，首先由於他不能遵守一個共產黨員應遵守的起碼的黨的紀律，由於擅自離開工作而自動脫離黨。」

#### 四、為張叫苦向陳冒火

適在昨日，我們接到一位讀者的來信，內容是為張國燾先生叫苦，而向陳紹禹先生等冒火。原題「關於張國燾來武漢」，其全文如下：

「四月一日，我到延安，張國燾先生還在城南的審判廳，承他以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資格，接見一次，談了三四小時話，我對他的印象是：和藹可親，眼光敏銳，思想正確，不愧為一革命的領導者。」

「十九日我回到武漢，二十二日正在屋子裏整理稿子，忽然有位朋友來告訴我，張國燾已被開除黨籍，主要原因是私自離開延安，跑來武漢。他並把一張新華日報拿給我。我當時很替張國燾叫苦，因為一個不顧生死，為共產黨苦鬥了許多年，地位已「政治巨頭」的有力量戰士，竟這樣的被輕易犧牲，實在有點太慘了！」

「今日下午二時，因為躲避敵機襲擊，我到了蘇俄的塔斯通訊社，一位朋友正在研究新華日報上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三人復子健的信，我也順便看了幾眼，可是這一來，我的感覺，已不是為張國燾叫苦，簡直是與對陳紹禹等冒火了，猶如我對敵機的襲擊冒火一樣。」

「張國燾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代主席，共產黨既然說陝甘寧邊區政府是統一的中央政府統治下的地方政府，即應承認張國燾是隸屬於中央政府統治下的地方官吏，一個地方的最高官吏，為什麼不能來武漢向中央當局有所請示呢？張國燾一來武漢，中共中央即以「擅離延安，私來武漢」的罪名，開除張國燾黨籍，這是不說明陝甘寧邊區政府，依然是共產黨的政府，依然是劃歸自衛的政府，依然是與中央處於對立地位的政府，依然是關起門來不讓官更與中央政府接近的政府！在統一戰線的聲浪被共產黨人高唱入雲的現在，共產黨竟仍有這種舉措：是不是正妨害了統一戰線，破壞了統一戰線，有礙分散和削弱抗戰的力量？」

「共產黨人口口聲聲說要自由，要民主，張國燾的地位，在共產黨中是最高領袖之一，在政治上是最高的最高長官，今竟因不住八路軍辦事處，不和周恩來同行，坐了非共產黨人的汽車而獲罪，這是否說明中共中央連人類最基本的自由和行動自由都剝奪去了！張國燾提出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應高於黨的利益，國共兩黨應做到精誠團結的地步，可謂切合當前的需要，不料中共中央不但不予採納，反而認為思想動搖，背叛了黨，突然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這是不不是又說明了共產黨本身根本就不民主！共產黨本身根本就不民主！共產黨本身根本就不民主！這是不不是又說明了共產黨有趁火打劫的嫌疑！」

「張國燾在啓事，明明說他對抗戰前途甚為樂觀，對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極端信任，陳紹禹等却偏偏拉出一些張國燾主張內戰的舊賬，企圖挑起國民黨員對張國燾的仇視，斬斷張國燾向中央投效的機會，這不僅沾污了一個政黨的政治道德，而且有人走上絕路的嫌疑！」（原景信。四月二十九日晚於漢口。）

# 談什麼黨派問題

胡秋原

百川·圖章二兄：

賜示囑撰「綜合評述國民黨外各黨派」之文，頗覺難于動筆，並非因這問題很大，實在因這問題太小。若僅寫一篇新聞式之文字，則將各黨派公布之主張重抄一次，評論一番，事至易也。但嚴格言之，今日除國民黨及共產黨外，尚有若干之政治意見，此自係事實，但能否稱為政黨，弟個人不能無疑。蓋既稱為一黨，應有其系統之政見，經常之黨務，而以中國之大，最低限度倘一黨無一萬以上之黨員，五省以上之支部，似亦難于言黨也。近人願言各黨各派合作，即民族之統一。弟意今日各黨各派，多非有何真實之基礎，而國中無黨無派者，恐猶保最大多數也。故各黨各派之聲愈高，國民即不勝頌賦之感。無論政府及國民黨對各黨派問題取何種態度，但國民所關心者，為抗戰之勝利，政治之清明，生產之發展，對黨派問題實異常冷淡也。雖然，人為政治動物，樹立政黨，亦為人權。惟在抗戰之中，應無黨派之餘裕，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已為一民治國家之時，自不妨大談而特談也。

論黨派可，論派最為可異。今日政治學中未聞有論派「派」者。中國之派可多至無窮，若欲集各派代表于一堂，固無選擇之標準，恐亦無此廣廈也。

弟今日之不主張「各黨各派」者，實因：第一，今日國家根本問題不在此。今日政治綱領已立，以後之事，即在實行。而實行一須用人，二須樹法紀。今日但有人才法律問題，而無黨派問題。第二，中國之朋黨主義，病國甚大，今日高談各黨各派，是長朋黨之風，于政治健康，頗為不利。第三，軍事生產教育為今日當務之急，使聰明才智之士分心于黨派問題，民族之損失也。

且今日之黨派問題亦不致成爲問題也。以政見而論，無論共產黨及其他政治黨，無論其主張何如，有不贊成抗日及抗戰建國綱領者乎？以法律地位而論，則法律範圍內言論集會自由，國民黨已承認之矣。若謂必須解決黨派問題集中人才，弟敢斷言

，有黨派之人才固多，但無黨派者，即無人才乎？若謂必須解決黨派問題集中力量，則今日「各黨派」果能代表全國之人民乎？

今日國家問題有千百倍重要于黨派問題者。而今日政治問題亦不在於黨派，而在於人才與法紀。如國民黨及政府勵精圖治，集中人才，樹立法紀，切實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國民決無問題。否則各黨派問題即解決，國事亦不得解決也。而同時所謂「各黨各派」亦應承認國民黨執政之既成事實，極力擁護領袖與政府，執行抗戰建國綱領，彼此民族空前大劫。即各黨領袖亦應抱此大志：國家用我，國家之福；國家不用我，亦以在野之身，爲種種努力及種種建議。不必以黨派問題爲號召，免增枝節！如政府有誠意，其主張自不致落空。若政府無誠意，即高談黨派亦無用也。

如果今日有黨派問題，即爲共產黨問題而已。但此問題今日事實上業已解決，即政府已承認共產黨之合法存在是也。今日自仍有若干特殊問題，即邊區與共產黨軍實之問題。但今日各種特殊問題，多，例如外蒙西藏問題。弟信今日努力抗戰建國，一切問題解決之可能性日大。在中國爲一民主國家之時，自不應有所謂邊區與黨軍；而在中國爲一自由聯邦之時，蒙藏自應爲聯邦之一員也。凡此一切，弟于拙作「中國革命根本問題」中均略言之，只要努力抗日，加速現代化之工程，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矣。

然最根本之問題，即在國民黨本身之健康與復興。有一鞏固賢明之民族中心力量，今日無不可解決之問題，明日亦無不可解決之問題。今日爲國民黨威信最高之日，亦無國鳴嗚望治之秋；與黨興國，國民黨之責，國民之望也。

總之，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大家莫談黨派問題。此弟函之微意。弟不僅今日無黨，如此主張；在日寇未逐之前，即有黨籍，亦必如此主張。即以此意答兄等之囑可乎？勿頌

弟 胡秋原。四月三十日。

## 五、兩個小小的疑問

我們對於本案的觀察，已如上文所述：「認爲那是中共的內部問題，無足重視」，本來不想說話。但看了上面各節以後，頗有一點疑問，最好請有關各方替我們解釋一下：

第一，照張國燾的聲明，「本人曾本以上主張，（記者按：此係指「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爲更切之響應，以邁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之力量」），與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三同志初步商討。不料此項商討僅在開始進行，中共中央突有開除本人黨籍之決定，公佈報端」。而照中共中央的通告，一則曰：「張國燾已於四月十七日在武漢自行脫離中國共產黨」；再則曰：「最後竟以書面申明自行脫離黨」。照此看來，兩造言辭各執，真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究竟內幕如何，我們實在莫明其妙。

第二，答子健的信，引張國燾最後致陳等三人的信，中有這麼幾句：「突閱報載有關除弟黨籍的決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萬一決定不能改變時，亦希彼此維持最好友誼」。照此說來，張國燾在被開除之前，似乎不願脫離中共，而在被開除之後，還想要求恢復黨籍。然中共中央的通告上却明明說：張國燾「最後竟以書面自行申明脫離黨」。這又是什麼道理？

我們發現陳紹禹先生等所發表的張國燾先生的最後一信中，曾用「……刪去若干句，（即在「深使我痛心」和「千祈我們間」之間），我們以其語氣推測起來，這被刪節了的若干句，與本案似乎很有關係，或者可以解答上面兩個疑問。不知雙方能否老老實實的把它完全發表出來？

願 我們 流 最後的「血」  
願 乎 孫 走 光明的「路」





# 從歷史方面說明中日兩國的前途

葉青

本文係葉青先生「從歷史方面說明中國不可征服」之第二節，因其內容除繼續前文說明中國之不可征服外，並對中日前途作一比較的研究，故特改用本題。(編者)

現在的抗戰，是全面的，與綏東之役和「一二八」之役不同。這種全面抗戰，是全國抗戰，全民抗戰。這就是說，全國軍隊都參加了，全國人力物力都發動了。我們用全國底力量去抵抗日本侵略。

這樣的大規模戰爭，是空前的。自從中國抵抗侵略以來，自從中國與帝國主義作戰以來，沒有像這次的。鴉片之役、英法聯軍之役、中法之役、甲午之役、八國聯軍之役、中國底作戰都不是全國性的。反之，那些戰爭在中國方面無一次不帶地方性的，總之，那些戰爭在地方上無一不帶地方性的。地方，至多不過數省。我們從不會發動過全國底兵力，更不會動員過全國底人力物力。這是很明白的，用不着舉例。

從前就不想以全國力量爭取勝利嗎？很顯然的是因爲從前工業不發達，所以交通不便利，一方面在軍事上運輸困難，無法調動全國底兵力，更談不到發動全國底人力物力了；一方面在政治上未曾統一，當時底統一不過說全國共戴一個君主而已，實際上則呈出一天高皇帝遠一底狀態，在地域和人口上均極渙散，如此根本沒有發動全國力量所需要之強固的中央政權，又怎會有舉國一致對外作戰的可能呢？

所以現在的全國抗戰，是中國歷史走到了工業階段的結果。因爲這樣，交通便利，一方面有發動全國兵力及一切人力物力的可能，一方面有統一形成有足以司此發動的中央政權，所以這能做出從前所夢想不到的全國總動員。

到成熟的地位，所以中國纔是一個新興的國家，有一種新興的精神。這可使我們在人力上，表現得非平常活躍。

這種新興的精神，首先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發生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近幾年中，它們做出不少的事業。在經濟上，對於工業農業和水利做了好些建設的工作，並且有整個的計劃。在政治上，有勵精圖治的精神，財政刷新(幣制改革)，吏治有相當改進。在軍事上，如注重國防，提高技術設備，講究軍事知識和政治教育，無人能否認者。在教育上，注重自然科學，加緊軍事訓練，實行會考，都是值得稱道的。至於在社會上所做的種種訓練，前已說過，不再贅及。凡此，都有事實存在，有成績在。所以歐美各國報紙會頌揚過，蘇聯報紙亦然。這不是一種新興的精神之表現嗎？此新興的精神是甚麼呢？民族思想，國家觀念。此外再沒有別的了。

它不僅在政府中發生作用，在軍隊中亦發生作用。抗戰開始以後，我們底武器本不及日本；然而凡受過訓練的軍隊都發揮了一種強大的戰鬥力。官長和兵士，全皆勇敢異常。他們前仆後繼，不稍退却。多以身殉國或殉陣地的，非常之多。他們留下了很偉大的壯烈的英雄故事。空軍，十分幼稚的空軍，同樣地如此。甚力量使他們這樣呢？民族思想，國家觀念。此外再沒有別的了。

全國人民在這次抗戰中表現了空前的團結。他們一致擁護領導抗戰的黨政軍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他們出錢出力，應徵應訓，就是抗戰使他們流離失所，亦無怨言。雖然在有些地方不曾做到好處，大體上總使這次抗戰成爲了全民抗戰。而且可注意的就是向來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黨派，所謂各黨各派者，亦皆棄成見，擁護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要求合作。甚麼東西使全國人民和各黨各派採取這種態度呢？民族思想，國家觀念。此外再沒有別的了。

這種民族思想，國家觀念底發生及其發展全圖表現出巨大作用的原因，在於中國歷史走上近代階段，工業發達，形成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底歷史階段是民族思想和國家觀念底興起時代，發揚時代。因爲這樣，它有團結我們、武裝我們、發動我們的力量。它是我們底靈魂和我們底動力。

於是我們底人力特別有作用。它能創造歷史，能消滅舊勢力，建設新國家。遇着了侵略，我們能夠抵抗。而且比在國內用起來還要作用一些。那時，人力底偉大要被我們發揮到最高的程度。這一點，便是中國不可征服底所在。

這種人力是新興的歷史階段底產物。所以這種人力給與中國的不可征服性，乃新興的歷史階段給與中國以不可征服性的表明。

進一步說，中國不獨不可征服，而且還有它底前途。它將成爲一個新興的國家。這只要把中國底歷史階段與日本底歷史階段比較一下，便可明瞭。現在請從歷史階段上展望中國和日本底前途。

「雖然日本侵略中國，想實現它底征服中國底迷夢；但是中國底前途比它好，它的前途則非常黯淡。」

拿一個譬喻來說。中國底前途，有如青年人，是生長的前途，上進的，要達到成年壯年黃金時代；日本的前途，有如老年人，是衰老的，下降的，再向前便是疾病、死亡、枯骨，趨於消滅。

爲甚麼呢？歷史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中國底歷史，由戊戌變法而辛亥革命而一五。四一文化運動而國民革命而統一戰爭，根本在革命底途程之中。誰不知道這些過程相當於歐洲底啟蒙運動、民主革命、民族獨立、統一運動？而這項運動，又誰不知道是歐洲每個新興國家必取其一二以作出發點的呢？所以我們在向着新興國家底途程中邁進。當前的任務，是創造近代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這是我們近幾十年不斷地維新革命之一總目的。

現在，這種努力已經很有成就。日本底侵略，本在阻止它，結果反作了促進底因素。正同法國革命遇着外敵一樣，革命不僅沒有破壞，而且反有高度的完成。到後來還產生了一個拿破崙，給外敵以報復，橫行於歐洲大陸之上。所以抗戰底結果，必然是近代的統一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之完全成功。

足見中國處在歷史中的上進階段，有如東昇的朝陽。

日本則不像這樣。它底上進階段是明治維新，它底明治維新相當於我們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統一戰爭。所以它底近代的統一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早已建立，以後經過幾十年底發展，達到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它底極盛時代，同時也是它底衰落時代。

關於帝國主義底衰落性，在今天沒有加以說明的必要。這應該而且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所以日本處於歷史底下降階段，有如西墜的夕陽。

中國與日本這種不同的歷史階段，我們還可以從任何方面得着證明。

試以政權來說。我們要求強固的中央政權，在於組織近代國家，是革命的；日本如果要求強固的中央政權，則為金融寡頭，是反動的。再以經濟來說。我們要求發達資本主義，足以消滅封建經濟，解決失業問題，改良大眾生活，能夠充實民族力量，有充分的進步作用；日本發達資本主義，則無此等作用，反之失業問題將愈擴大，大眾生活將愈痛苦，其結果還要發生屠殺人類、破壞文明的侵略戰爭。

中國在前進的、革命的途中；日本在後退的、反動的途中。

這在戰爭上表現得很明顯。中國官兵，一聽說與日本打戰，歡喜極了。到戰場上，個個踴躍，人人爭先。他們以血肉抵禦日本底飛機大炮，死不退却，有時長官就叫他們退，他們也置之不理，甚至全營全團殉陣而死。空軍

健兒駕飛機去作戰，好像小孩放風箏一般，興高彩烈，勇敢異常。他們底字典中沒有「怕死」二字。中國底抗日戰史完全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傳，其悲壯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日本不然，它底官兵在明治維新以後是「新戰死」，現在則是「千人針」時代了。官兵身上都帶千人針以避槍炮。徵兵之令下時，大家規避；家人送到車站或碼頭，情景淒涼；到了戰場，不敢肉搏衝鋒。一般說來，他們不願意戰爭，所以戰場上出現了很多反戰傳單、厭戰日記及怕死書信。他們打戰，除了飛機大炮以及盡量消耗子彈外，別無它長。人底戰鬥精神和戰鬥作用，幾乎一點沒有。

日本民族衰落了，他底「太和魂」已經沒有了。中國民族是新興的，所以人人「祈戰死」。這是鐵的事實。

因為這樣，中國不怕打，它是青年民族，愈打愈成長，愈強壯，愈打愈團結，愈有力量。很顯然的，戰爭一長了，中國的生產可以發達，訓練出的軍隊很多，社會的團結更固。日本怕打仗，因為它是衰老民族，有愈打愈乏力和愈打愈分散的危險。戰爭一長了，日本不是要發生經濟崩潰，社會革命或政治革命，使它自己否定自己嗎？

這是中國利於長期抗戰，日本利於速戰速決的原因。兩個國家底戰略是兩個國家底民族氣質底反映。

假如這些都是真理，那末我們與日本作戰的勝負不是已經決定了嗎？毫無疑義的，最後勝利屬於我們。

甲午之役，我們所以失敗，是因為我們那時在歷史底下降階段的緣故。那時進行抗戰的人不是處於封建時代之末的衰老勢力嗎？

現在我們轉運了，處在歷史底上升階段，不論勝利之獲得在這次抑在將來，都必然使我們成為新興的國家，雄飛亞洲，作朝鮮和台灣等等被壓迫民族底解放使者。日本呢？它底失敗不論在這次抑在將來，均將解體，為內部的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和民族運動所打倒。不要說日本會幹中國不會幹吧。須知明治維新

一舉成功，推翻封建，展開了它底新時代，是因為日本土地極小，人口無多，文化傳統缺乏的緣故。中國不然。它底土地廣大，人口眾多，文化傳統悠久而充實，所以推翻封建，展開新時代的工作不容易成功。由戊戌變法而辛亥革命而五四文化運動而國民革命而統一戰爭，要經過幾十年。一個大國家底改革，往往如此。你不見法國單是民主革命就已經過了八十年之久而後纔成為定局嗎？所以我們不能以中國改革費時很多一點作為它不及日本能幹的證明。

中國民族是能幹的。比之日本，特別可以這樣說。拿事實來看吧。中國在過去幾千年間有偉大的成就。它把從前一點點的土地，推廣到了三千五百萬方里，佔全世界陸地十二分之一。它以前很少的人口，同化國內外無數民族，變成了四萬五千萬之多，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它把從前原始的文化發展了，延長了，使它成有一有四千多年歷史的國家，造出有價值的文化傳統，為全世界上數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不僅完成了自己底發展，而且影響其他國家。東亞底歷史不過中國底歷史而已。日本呢？小國永是小國，文化更談不到。它除了接受中國文化成為中國文化之一支外，有甚麼東西？它在這長期的歷史中簡直沒有事業同我們比。

我們不要因幾十年底改革不及日本就小視我們自己。我們有偉大的前途。而且我們之有偉大的前途正同我們之有光榮的過去一樣。日本無論在那方面都趕不上我們。它只是一個「小鬼」。它底沒落，不過時間問題而已。（註）

那末，中國會失敗嗎？會被日本征服嗎？否。中國現階段底歷史保證了中國之不可征服。

一九三八，四，三寫於江陵中央軍校特訓班。  
（註）括弧中是一篇文章，題名中日前途之展望，寫於一九三七，十，二七，刊於南京新民報同年同月二十八日。同年十二月末日曾交萬縣川東日報重行發表。



## 蔣委員長與陳英士先生

——「蔣介石將軍」英文傳記之一章——

葛雲譯

一九一一年十月 蔣委員長和其他一百二十個革命黨人由日本歸國，這顯然是冒着很大的危險的；這連他們自己也能猜想到，但他們不得不碰一下運氣。因為這個時候革命運動還沒有顯著的成功，他們登岸的地方，上海，是個入海口，滿清政府在這裏嚴厲的防範海外歸來的革命黨人。這樣，蔣委員長和他的同志，好像是把他們的頭伸進了獅子的嘴裏。

他們在東京的活動，滿清當局並不是不知道。後者雖沒有什麼很好的情報工作，可是 孫總理和其他重要的革命黨人以及日本軍官學校中國學生的普遍的反滿情緒，當然不爲在東京的滿清的代表所忽視。所以 蔣委員長的名字或許也在被緝捕單上；如果他回國的時候被捕，那麼在短時間之內就要引渡的。

但是 蔣委員長的運氣很好，他和他的同志平安的登岸了。他的第一個步驟，是和正在上海秘密指揮反滿清運動的陳其美(英士)氏取得聯絡。陳氏在東京看到 蔣委員長時，已對他發生很好的印象；而 孫總理也看出 蔣委員長是革命的漸漸升起的希望之一。因此陳氏熱烈的接受了剛從日本回來的 蔣委員長所給予他的幫助。

同時，陳其美氏曾到杭州去過一趟，他相信在杭州建立革命的根據地是很合適的。他的計劃是先克復杭州，然後佔領上海兵工廠。上海兵工廠能得手，上海必可克復，然後派遣軍隊佔領蘇州和滬寧

路沿線各城，最後攻取南京。可是在杭州和浙江省各處的革命黨人，都不贊成這個計劃，他們堅持第一個目標應當是佔領上海兵工廠。

陳氏因此回到上海，他和 蔣委員長，(這時他已在實際上成爲陳氏的參謀長)，擬出一個進攻上海兵工廠的新計劃。同時，滿清當局已深深感覺到他們的危險；兵工廠的防禦工事加強了，除衛兵外，兵工廠裏又添駐些特別警察隊；在黃浦江裏，又停泊一艘砲艦，這也是爲的協同防禦。像這樣的警戒辦法，在吳淞要塞內也有。碼頭上車站上檢查旅客比以前更嚴格了。旅館裏也有突如其來的搜查，以冀緝捕革命黨人。

因爲在上海租界出版的革命黨報紙的推翻滿清的論調，更加激烈，滿清當局的恐慌又增加了。他們死亡的努力募兵防守兵工廠，並使商民及上流社會深信擁護滿清政府於他們最爲有利。但這些瘋狂的努力是太晚了。他們最害怕的革命黨人，已在堅決不懈的工作着了。說一句中國的成語：杯水車薪，何濟於事？

最後，陳其美和 蔣委員長終於把計劃擬定了。這計劃規定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在上海和杭州同時起義，雖然以後又變更了。陳氏在上海指揮，蔣委員長到杭州主持。他於十月底到達杭州，作佔據該地的最後準備。革命黨人的軍事設備太差了，幸而當地的商團同情革命運動，並願供給他們四千箱軍火。

那時決定由敢死隊先發動，因此發生該隊的適當的領袖的問題。蔣委員長立刻自願擔任這個危險的任務。他率領不滿一百的人數，在十一月四日下午兩點鐘，由奉化同鄉會衝出，向滿清政府駐紮在杭州的優越的軍隊挑戰。雖然敵軍的數量超過他們的很多，可是這個勇敢的敢死隊，(其中還有兩個女革命黨)，還是照着計劃進攻總督衙門。他們拋擲炸彈的效力之好，竟使衛兵很快的喪失紀律，並四散逃命。衙門被放火了，並且不多一會全城也光復了。敢死隊得勝以後，第二天就克復滿旗營盤，並建立臨時革命政府。

我們回憶起來，這樣少數的有絕大的決心的敢死隊，在遇着數目比他們超過多多的可怕的敵人，竟能得到勝利，這好像幾乎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他們的成功，對於革命是十分重要的，但從寫傳記者的觀點上看起來，又有一個同樣的有趣的事實：這一回是 蔣委員長第一次上火線。通常都認爲這是軍人的決定的試驗；我們的 蔣委員長是光榮的顯異的經過了這個試驗了。在「浙江革命記」一書裏，著者顧乃斌詳細描寫這次作戰的情形，並且把浙江的克復主要的歸功於 蔣委員長。顧氏曾把這書送了一本給 蔣委員長，因此引出 蔣委員長一封代表他的個性的信。在那封信裏，他很清楚的指出他自己並不貪求光榮，並要求在下一版裏對於顧氏的沒有提到的參加那次戰役的其他敢死隊員，都要予以正確的評價。他特別指出他認爲值得褒揚的幾位同事。這種歸功別人的態度，是他此後許多次不願獨攬功勞的典型的表現。

杭州舉事的前一天，陳其美氏在上海揭起革命的旗幟。按照他和 蔣委員長擬定的計劃，在十一月三日的下午，革命黨人放火燒了毗連公共租界的閘北的各警察局，而且不多一會，就佔據了那些地





# 湘行雜憶

陳之邁

最近得到了一個機會，到湘西一行。

湘西一帶一向被人視同化外，總是說那裏的民風刁悍，不易統治，——這都是常常見諸公文的說話。在一般未到過湘西的人看來，所謂民風刁悍，就是土匪橫行，殺人越貨，以致商賈裹足，生產落後。

我們要曉得所謂湘西，是包括常德、沅陵、芷江、鳳凰、乾城等二十二縣的地方。那裏的風景優美，在蜿蜒於崇山峻嶺中的公路上，我們坐公路汽車的時常會恍目驚心，看着窗外起伏的山嶺而戰慄。但就在這個地方，產生了中國古代許多的文人韻事；陶淵明所描寫的桃源洞，就在常德到沅陵的公路旁邊；楚辭中重要的一條沅水，正流在沅陵縣城以外，然而這個地方是被人視同化外的，自然有其特殊的原因。

我們先談土匪的問題，或學當地文人所說，「在鄉軍人」的問題。在以往湖南的省政是腐敗污濁的政治。湖南本來是一個富庶的省分，但就因為他富庶，所以吏治便成了問題，正如富庶的廣東四川，其吏治成了問題一樣。在那個時代的省政府是到處設法盡其敲詐剝削的能事。據當地的人說，湘西自民國以來，一共有十幾位鎮守使，每一位都是因此而成了百萬的團團富翁。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雖然在這方面有相當改革之處，但是省府方面

一向是抱定政策把他們沒有方法來支那的人往湘西去塞，這些人了解到自己政治生涯的危殆，也就盡力的在民間去搜括項囊，到了不得已時便棄權而去。辦理湘西吏治的人，從來沒有好好的人，從來不會替湘西的民衆作一絲一毫的打算。中央或省府新政的設施，誰知是省吏們敲詐攤派的機會；保甲如此，國民大會選舉如此，飛機如此，防空如此，徵兵、民訓、民衆組織亦莫不如此。

這個政府萬般罪惡叢生的地方，自然便成了反抗政府的淵藪。這裏的軍隊保安隊有坐地食糧的權利，但沒有維持地方治安的義務。在此情形下，一般窮苦人民，便在官府剝削節衣縮食之餘，省下餘錢買他一枝槍，幾十百發子彈。這些槍枝子彈，在比較剛良的百姓手中是自衛的工具，在比較年青力壯好勇鬥狠的百姓手中，往往便成了「落草」的敲門磚。湘西的土匪問題，簡單的講是苛政腐敗逼出來的，官府的文書裏說那裏的民風刁悍，實在是把責任往人民身上推的勾當。

然而這個土匪問題却越來越嚴重起來。長沙對付湘西的辦法是派兵前去剿辦。如果長沙方面來的軍隊真是能打仗的軍隊，是區區少數的人也絕非對手，很容易便可以解決。但是長沙當局所派的「三湘子弟」並不是驍勇善戰的鬥士，到了湘西往往是棄槍而逃，就是當年實屬到了沅陵也怨不多。這些軍

隊的逃走，增加了民間的槍枝的數目，所以越剿是土匪越多，一個惡圈子循環不已在那裏兜轉。湘西的人民能夠深明大義，擁護中央，擁護蔣委員長；他們並且能夠體會民族的危機，極力主張抗日；在杭州蕪湖一帶守土抗敵，現在擔任游擊的便是湘西的健兒。去年我在湖南同他們的高級長官談過，他們負傷歸來補充軍隊。他們是英勇果敢的民族英雄。但是他們都在近十年來始終揭發着反對長沙的旗號；這也難怪他們：長沙實在太對不住湘西了。長沙的人不管湘西，有錢不拿到湘西來用，就是高級的行政長官也總是藉口土匪問題連沅陵這種地方都不敢去走走。湘西之所得於長沙的，最好不過是笨拙庸碌的官員，其實最大部分是最能剝削人民的胥吏。所以「抗日，擁蔣，反X」，便成了全湘西的一致的口號。

後來長沙的確也有些覺悟了，湘西的問題不能就在這種情形下延宕下去，在抗日軍興以來，湘西還鬧了一次變亂，這也使得長沙難堪，免不了中央及輿論的譴責。但是他們仍然想不出辦法來。到了長沙換人了，這個湘西問題才算是部分的有了曙光。那時的辦法是在湘西——沅陵——設立了一個「經署」，其用意在緩靖湘西。但是十八萬元的經費，數月的時間，這個「經署」除了一紙公文報告外，一件事也沒有做成。近一個多月來，湖南省政府下了最大的決心，要把湘西重新建設起來。這次建設的方法在沅陵設立一個「沅陵行署」，以省政府委員陳雲珍先生擔任沅陵行署主任的職務。這是一個最大的進步。陳老先生是鳳凰人，是湘西一帶的人民，包括所謂「在鄉軍人」在內，同心愛戴的人物



。他已六十多歲了，但是精神矍鑠，絕不與他的年紀相稱。他是師長，同時也富有行政經驗。但是他第一個重要的任務仍然在「整軍」，亦即是收編一切民團的槍枝，使其能為國效勞。我到沅陵的時候，陳老先生也適才到那裏。四鄉的軍人都到行署來了，沅陵這一座污穢和狹隘的小城滿裝着精神抖擻，帶着（甚至於拿着）光亮鮮明的盒子砲的壯士。他們是「要人」們的衛士，他們的主人正在這裏同陳先生談論「整軍」。將來陳老先生還要到各縣去巡察，而乾城而芷江而鳳凰，現在當然還未到完全成功的地步。但這是湘西的一線曙光，因為唯有用這種光明磊落的方法才能把這個嚴重的問題相當的解決。

湘西不是不富庶的地方，人民並沒有什麼特別刁悍難治。土匪是官府迫出來的問題。其實我們用不着談生產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才能解決湘西的問題。只要政府能下個決心，改良吏治，並不需要停止推行新政，只要不借新政來敲詐剝削人民，湘西便能成爲安樂之上，富庶之士。

湘西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苗民的問題。其實苗民根本不成什麼問題。苗民有語言，但相當易懂，並不如廣東人學國語那樣困難。他們有極簡陋的象形文字，但因為過於簡陋，同蒙古滿族尚不可同日而語。苗民沒有悠久的光榮歷史，如蒙古一樣，故他們不反對漢人去同化他們。反之，他們一般的以漢化爲上進，爲榮譽；脫去了苗衣，穿上了漢服，是長進的一種表徵。他們肯同漢族通婚，然而只是以苗女出嫁漢人，漢女嫁到苗家是不可能的。同時，苗女也並不是不堪人目的女子，他們比較醜，像

西洋人一樣眼睛深入些，但一般的能刻苦耐勞，終日工作不息。湘西的漢人已經是女人工作的多，車站上的「脚行」大半都是背負竹筐的青年或中年女子。男子也有工作的，但許多則只在家裏抱孩子，閒來到市集上去鬥雞。就是那些工作的男子，如車站上的小販，也往往用籃盛着他的兒女，荷在背後。湘西的漢人女子工作的多，苗人則男女均作。只是他們的文化水準太低，工作的效率太差，沒有改造環境的能力，終日胼手胝足，除了供政府的剝削之外，勉強掙得個溫飽。苗人不是可怕的民族，他們不構成一個嚴重的少數民族問題。同湘西的土匪問題一樣，只要政治比較清明，只用教育便能將其問題解決。

現在到湘西去，最令人興奮的是它真正的是一個抗戰期間的後方。在常德到沅陵芷江平坦的公路上，我們可以看到成百的載重汽車，搬運着國防必需的用品。險峻的山嶺，使得敵人無論如何不敢侵入那個地方。因此，我們在那裏也可以儘量的布置。我在沅陵盤桓了十幾天，時常看到聽到許多令人十分興奮的消息：可惜因爲事關國防，要到戰事結束後才能向讀者報告。但是我不得不把我的感想寫了出來：這樣有好的，這樣有用的地方，我們爲什麼讓軍閥官僚把它剝削成這種慘象？我們爲什麼不計劃地利用那裏豐富的寶藏——桐油、木材等等，來杜塞我們的漏卮，增高我們的生產？我們爲什麼不利用科學的方法來調查湘西，研究湘西。開發湘西？我見到陳主任，同他談到這些，他在原則上是完全贊成的。但是幾十年來污濁的吏治，又豈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良的！數年前我和幾位朋友討論中國政治，一致認爲中國政治的貪污充斥，是使我們不

能振作的主要原因。中國官吏幾千的貪污，已經使得「昇官」「發財」成爲一氣之良辭了。老百姓看到一個清官——其實不過守其本分而已——便如獲至寶，甚至引以爲奇。湘西今日的漢民，其苦就是貪官污吏造成的。我們不要利用湘西，把湘西拋棄，便無語說；否則這個國防關係重要的後方，非得切實的振作一番不可！而振作之道，根本就在改良吏治，剷除貪污。在這個緊急關頭，我們可不要再因循於人事了。

二七、四、二六。

### 爭論中的幾個問題

陶百川先生著「爭論中的幾個問題」一書，業已出版。作者在自序中說：「這本小書觸及的問題，共計七個：（一）關於三民主義的論爭；（二）關於黨派問題的論爭；（三）關於民主政治的論爭；（四）關於民衆運動的論爭；（五）關於戰時教育的論爭；（六）關於抗戰中的態度問題的論爭；（七）關於民族精神問題的論爭」。對於以上七個問題，作者都提出了他的見解和主張。定價一角五分，本社發行。

### 為鼓舞青年作家

#### 徵文啓事(六)

本社爲鼓勵青年無名作家之文興趣，特由本社社長陶百川先生每月捐洋四十元，每期舉行徵文一次，每次錄取一二篇，每篇致酬二元至七元。茲將第六次辦法揭載於後：  
一、題目：「對於本刊的批評和建議」  
二、字數不拘；五月二十三日截止。

# 戰局

## 烏敵

### 敵攻勢頓挫我全線反攻

楊家麟

#### 血染河山我邳縣台莊依然無恙 情格勢禁敵磯谷板桓有計難施

最近敵人向魯蘇邊界猛烈進攻，在邳縣東北台莊東南一帶，形勢尤為嚴重。我軍經過一旬餘的苦戰，終於把陣地穩定了。我們的穩定，就是敵人攻勢動搖的先聲；因此，我們於三日晨拂曉，開始全線反攻，大概再過三五天，形勢即可明瞭。

敵人這次原是分三路南侵：左翼係沿臨邳公路

侵入邳城；邳城與隴海路東段很接近，故隴海路的新安站附近，曾一度發現敵蹤。可是，這時敵中路在邳縣遭遇打擊，邳城敵軍遂不能不分兵增援邳縣；同時，我們增援右翼的樊峯南都已到達邳城以南，開始反攻，並於廿九日一度克復邳城。邳城的西北有一個馬頭鎮，敵人現在集中重兵於此。我樊軍最近已再度向邳城馬頭鎮反攻，我們由臨沂退守的張自忠部，亦南下夾擊。假若我們能確實克復邳城和馬頭鎮，則深入邳縣之敵，可能被我們包圍聚殲。

敵人的中路係由蘭陵，越洪山，侵入四戶鎮；四戶鎮在邳縣的東北，地勢很重要。二十六七日，敵續向我四戶鎮以南的陣地猛攻，以致我連防山，胡山、鍋山、蕭莊等處，均被敵突破。由連防山南下不遠，就可截斷臨台線的南端，並且即可逼近徐州。因此，當時這方面的形勢，頗為嚴重，但經我湯軍謝軍關軍奮勇抵抗，且不時反攻，卒於二十八日克復密河鎮、馬甸等要隘，敵傷亡達三四千人。

目前敵人在這方面的攻擊精神銳減，而我軍某部，已迂迴至四戶鎮東北地區，向敵側背攻擊。據最近私人所得的消息，我們現在快要把深入邳縣的敵軍，兩重包圍，一俟增援的大批調整師到達後，即可大舉殲敵；敵人雖亦向其國內請求增援兩師團，但恐怕是緩不濟急的。

敵人的右翼，係向臨邳台支線進攻。我孫軍三十師和一百十師，在泥濘以北的望仙山和鉄角山與敵對抗，一日至三日之間，敵一再猛攻，均為我孫軍擊退。我們在鐵路兩側的曬米場，前後城一帶的，是七十五軍周學部；在蘭成店附近的，是孫軍二十七師和九十一旅；隣接孫軍右翼的是三集團于學忠部兩師。一日，敵第十師團主力向我于軍陣地，黃莊、趙莊一帶猛烈進攻，卒為我軍擊潰。隣接于軍右翼的是我盧漢軍三師，二十七日，敵由蕭莊，後堡向盧軍進攻，被我張師將竄入之敵三千餘人誘入山凹，全部撲滅。我軍目前在這方面的任務是固守陣地，以期待右翼邳城方面和中路邳縣方面的總攻。

綜觀右翼中路和左翼的情勢，敵人增援後的攻勢，確已頓挫，我們反攻的時機，業已成熟。但敵人在此勝負關頭，當然絲毫不肯放鬆，故除向國內請援外，業已向魯西和南陽湖方面，厚集援兵，準備迂迴進犯。

二十九日，敵軍由長清，泰安分三路向肥城一帶集中。三十日，敵續由肥城南進。一日，敵先頭部隊與我軍在王晉以西地區接觸，而其後續部隊，則有由肥城轉向西移模樣。同時在濰縣方面的敵軍，亦侵入南陽湖心之南陽鎮。我們目前已在豐縣、沛縣和金鄉、鉅野之間，嚴重佈防，但敵人想由這兩方面，擇虛逼近隴海，以牽制我魯南的大軍，這是很明顯的。

在蘇北方面，敵軍於二十六日陷鹽城，並北竄阜甯。淮南方面，敵由江南抽調萬餘人渡江，攻陷和縣、含山及巢縣，巢縣在合肥以南，敵現在仍沿淮南路繼續北竄。因此，淮南敵軍可能由巢縣、全椒、定遠三處進窺合肥，以解除津浦南段之威脅；同時亦可能由蚌埠、懷遠北窺，以呼應魯南和魯西的攻勢。

在綏遠方面，我軍連克清水河、涼城、和林等縣，現已續向歸綏挺進。晉東南方面，我繼續克復晉城、沁水及翼城。豫北方面，我左翼克復濟源後，曾相繼克復孟、溫、沁源、沁陽等縣。目前敵大部集中於我右翼之封邱，我已向該地三路進攻。江南方面，我正猛攻孫家埠宣城以及浙北之富陽。

此外，還有值得我們興奮的，是四月二十九日，我空軍在武漢擊落敵機二十一架。在四月內，我空軍在魯南前線，協助陸軍，大舉轟炸敵敵。同時，在大勝關、歸德和廣州的上空，都擊落敵機多架。但戰鬥之勇，殘敵之多，則以這次為開我空戰的空前紀錄。一個强有力的空軍，是將來最後決勝的要素，最近看我們空軍威力的迅速成長，足徵我們抗戰前途漸露曙光了。



## 眼前的國際局勢

王龍章

英意協定後的幾種談話之分析

英意協定成立後，接着英法談話，業已「圓滿

結束」；法意協定，據傳將於十三日簽字；已到羅馬的希特勒，其任務是德意會商；英德談判不久還要舉行……這一串合縱連橫的把戲，看來好像複雜，其實都是張伯倫均勢外交下的應有的產物。

先說英法談話。英國心目中的「義務」是西歐，過去扶德抑法的一套，她已認為不適用於目前。英國既已與意大利訂立英意協定，勢必推進法國來

鞏固半面孤德的防線。英國既願保障法國的安全，自可使達拉第安心趨向於倫敦，同時又促成法意接近，更可使希特勒在中歐不得不稍存戒心。法國呢？她所夢想多年的英法軍事同盟，現在實際上已算成立，比較可望而不可及的法蘇協定，至少要來得切實；同時如不走上英法意協調的道路，今後亦將失去地中海政治地位。所以英法談話的效果：第一，英法軍事同盟的內容，我們雖不得而知；但兩國參謀團就要會商，至少可證明軍事方面已有聯繫，西歐安全，足資保障。第二，關於捷克問題，英法會商捷國讓步至最高限度。假使局面再趨惡化，英法因對法關係，今後可採取較為負責的態度。第三，英意協定中的兩個先決條件，即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亞問題，法國可支持英國，促成早日清算和解決。然而此中有一點，英國雖是在孤德，一面仍開着聯德的談判之門。孤德即所以聯德，並不逼迫德國

跳出英法的範圍以外。法國對德是守勢，對英國的做法，六分歡迎，四分拒絕；這是英法在內心上對

德看法的差異。

談到法意協商問題，我們不能不略叙其歷史。法意這兩位拉丁姊妹花，戰後曾以利害衝突，站在相反地位。因為法國是「滿意」的國家，主張維爾凡爾賽和約，而意大利所得無幾，埋怨英法，立於「不滿意」的國家的地位。自一九三五年一月成立羅馬協定，法國以在非洲殖民地問題上對意讓步，換得意國在歐洲政治上的合作，到了斯特萊柴陣線完

成，更由協和而達於密切。但是好景不長，阿比西利亞和西班牙問題相繼發生，意國因為法國對於國聯制裁辦法的曖昧態度，對法表示不滿；法國因為意德援助西班牙國民軍，發生怨望。今年春間，雙方幾乎有動武的可能。

然而法國的主要政敵是德國，意國的最大衝突在英國，談不到什麼深仇大恨。所以希特勒一經併奧，馬上使有難言之痛的墨索里尼，就與英國妥洽。經過英國紳士的拉攏，法意談話即迅速舉行。一般人預料兩國正式協定，可以繼續實現。今後假使法意能夠妥協，歐洲的安定局面，自會更有保障。不但存於英法意間的磨擦，可以一掃而空，就是德國在中歐的態度，也可看此次德意談判如何而定。不過，法國為求捷克問題能相當的安定和西班牙問題能有利的解決，對意的談判條件，也許是要讓步一些。

至於德意兩巨頭的會晤，現為惹起國際間注意的一件大事，因而各國政論家發生幾種不同的觀察

：就德國方面看，一是以為希特勒鑒於英國的孤獨政策，減輕了德意軸心的價值，對於中歐問題，併奧而不敢侵捷，擬藉這次兩雄晤面的良機，重新樹立合作條件，好使德國能跳出英法聯防的包圍網。另一方面認為德國已處於英法意三國陣容以外，為了避免孤立起見，明知將來要接受對英談判，甚至走進四強協約的圍地，但為着抬高身價，不能不虛張聲勢，表示柏林羅馬仍在親熱，好使未來的英德協商，對德比較有利。所以我們對於此次訪意的作用，不必重視，更不致成立何種協定。就意國方面看，有些人說墨索里尼是一位唯利主義者，證以羅馬這次盛大歡迎的情況，似乎在希特勒身上，另外有所企求。況且外交是多邊形的，意國在地中海，西班牙，多瑙河，中歐，均有舉足輕重之勢，她或不肯受英意協定或法意談話的約束，而拋棄其願以發揚滋長的德意軸心，也許要另外再求比較更有算盤主義的發展。此外，也有些人說，意國此次眼着中歐一塊肥肉，已被希特勒吃去，內心上實有說不出的苦衷，絕不願再助長德國向外發展。而且德意談話既在英意協定以後，而法意談話又就要告成，可見意國是在德與英法間担任斡旋工作，或將進而勸告德國，共走同一道路。我們對於以上的推測，雖不便武斷，但就常識說來，德已併奧，意已吞阿，英法聯盟又成事實，在大家均在避戰的現在，意國恐怕仍是將勸告德國共走和平之路。所成爲問題的，只是希特勒究以驕子身份抑以被動身份與張伯倫握手而已。

關於上面幾種談話的趨勢，美國雖同情英國穩定歐局的苦心，却不大贊許戰前的同盟制度；俄國外交雖因孤立傾向而在感覺煩悶，但英國決不肯把現為國聯台柱之一的大國擠出日內瓦。而歐洲愈安定，日本就愈感不安，所以兩進乎，北進乎，已在爭執得不能解決。日本政府只有違反對議會的諾言，擬將「對華作戰，不予實施」的總動員法案，擬於本月五日實施，希望速戰速決，以避免國聯壓迫下孤立外交的危險。